

中州

近代中国进口替代工业 问题研究

JINDAI ZHONGGUO
JINKOU TIDAI GONGYE WENTI YANJIU

● 苏全有 王惠敏
董延寿 主编

● 中州古籍出版社

近代中国进口替代工业问题研究

主 编：苏全有 王惠敏
董延寿

副主编：申成玉 王敬平
王宏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近代中国进口替代工业问题研究

苏全有 王惠敏 董延寿 主编

责任编辑:康华 责任校对:元君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河南省新乡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25 印张 332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₇-5348-1952-0/K·778

定价:26.00 元

前 言

近代中国进口替代工业问题是史学界尚未全面、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目前,在大陆方面,经济史研究者往往是侧重于资料的梳理与工业史发展表征的论述,进口替代工业的概念尚未成形。在港台地区,虽有一些研究触及到这一领域,如关于军火、鸦片的生产等,但也只是个别的现象。总体看来,学术界对该课题的研究力度不够,重视不足。

事实上,近代中国进口替代工业问题不仅仅是近代国人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而且是今天的人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作为一个后发展型现代化的落后国家,当务之急就是赶超西方先进国家,实现现代化。而作为现代化重要表征之一的工业现代化,它的实现之日,即为进口替代工业达到了很高的发展水平。因为,对于一个主要依靠进口工业品的国家,怎能谈得上工业现代化呢?故而,从这一角度看,对该课题的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应该说,进口替代工业问题从属于现代化研究领域。目前,西方现代化理论研究渐趋冷落,以美国为例,曾被视为现代化比较研究佳胜之地的普林斯顿大学国防研究中心,随着 C. E. Black 的去世,已呈风流云散之势。欧美一些学者热衷于研究后现代化(post-modernization),社会上也因逆反心理而衍生出反现代化运动(de-modernization movement)。当然,由于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正如营养不良的瘦弱者不宜仿效脑满肠肥的胖汉去减重一样,我们目前不宜趋西方新潮,从而放松作为当务之急的现代化道路探索和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努力。对于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我们不仅不能照搬西方,而且还应该对其有更深刻的思考。西方的现代化

历程我们要借鉴其经验,而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有上百年的历史,这也需要进行回顾与总结。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物质概念,还是一个理念,如果缺乏冷静的反思,结果只能是肤浅、短视和急功近利。历史学的功用就在于针对现实需要,提出重大课题,并进行前瞻性的研究,以指导我们的行动,使之避免盲目与无序。在这一问题上,既需要国家的重视,又需要学者更新观念,过于碎化、细化的研究,于事无补。

通读本书,其基本内容主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起步的动因。我国在鸦片战前即已开始在一定规模上进口外国工业品,鸦片战后更加严重,并引起了国人的注目,这当然是进口替代工业起步的根本动因,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原因呢?其次是发展进程。进口替代工业首先在哪一领域起步呢?它如何完成了由生物动力向非生物动力的转型?第三是各部门的具体发展状况。这些部门计有矿冶、机器、纺织、军火、烟草、火柴、造纸、印刷、食品加工、缫丝、面粉、钢铁制造等,它们的发展进程究竟如何?第四是资本问题。我国的工业资本在近代十分复杂,它包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外国资本以及狭义上的民族资本,这些构成我国近代工业资本的因素成何比例?状况如何?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如何形成的呢?第五是进口替代工业的思想代表者与身体力行者,他们有什么样的认识?又是如何付诸实施的呢?第六是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技术革新及商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问题。是书就是对上述问题的解答。

苏全有同志是一个勤于思考、颇有见地的年轻学者,最近几年来写了许多文章与书,是书就是他与他人合作的又一力作。我们期待着本书能够给战斗在第一线的经济工作者们以帮助、启迪,能够对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尤其是工业现代化的实现发挥作用。

华东师大历史系博士生导师谢俊美教授

2000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总论	(1)
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1)
二、近代进口替代工业状况	(11)
(一)近代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概况	(11)
(二)近代进口替代工业经营方式	(20)
(三)近代进口替代工业的特点	(31)
三、影响近代进口替代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34)
(一)资本因素	(35)
(二)市场因素	(40)
(三)科技因素	(42)
第二章 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47)
一、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	(47)
(一)地主、官僚阶级	(48)
(二)买办阶级	(50)
(三)商人	(52)
(四)绅商阶级	(54)
二、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及结构	(56)
三、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	(63)
(一)一身多任,内部分化组合不充分及分野不清晰	(63)
(二)实力有限,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65)
(三)内部结构失调	(68)
四、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	(69)
五、中国早期的无产阶级	(74)

第三章 陈炽的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思想	(85)
一、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乃西学的必然结果	(85)
二、各领域的进口替代设想	(90)
第四章 张謇的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思想与实践	(95)
一、进口替代工业思想的产生与实践	(95)
二、进口替代工业思想产生的原因	(106)
第五章 袁世凯的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思想与实践	(113)
一、对外理性抗挣, 构建进口替代工业的基础	(113)
二、倡国货、拒洋货、营造有利的进口替代工业氛围	(118)
三、引进外资, 积累进口替代工业的资金	(121)
四、引进、推广机器, 扶持民族工业发展	(124)
第六章 孙中山的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思想	(135)
一、引进外资, 对外开放——发展进口替代工业 的要求	(135)
二、振兴实业——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体现	(146)
三、实业计划——伟大的工业现代化构想	(151)
第七章 开风气之先的棉纺织工业	(165)
一、棉纺织工业发展状况	(165)
(一) 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	(165)
(二) 中国近代民族棉纺织业的发生和发展	(173)
(三) 帝国主义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棉纺工业的 排挤和打击	(179)
二、近代棉纺织工业典型个案举例	(184)
(一) 上海机器织布局与华盛纺织总厂	(184)
(二) 湖北纱布官局	(192)
(三) 南通大生纱厂	(197)
第八章 煤矿业	(203)
一、官僚资本垄断的煤矿业	(205)

二、民族资本经营的煤矿业	(220)
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煤矿的掠夺	(226)
(一)英国对中国煤矿的掠夺	(228)
(二)俄国对我国东北煤矿的侵略	(235)
(三)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国煤矿经过	(237)
(四)德国在山东煤矿业中的侵略活动	(240)
第九章 金属矿业	(244)
一、金矿	(244)
二、铜矿	(249)
三、锑矿	(253)
四、银、铅矿	(255)
五、帝国主义对中国金属矿业的掠夺	(259)
第十章 机器缫丝业	(268)
一、中国蚕丝对外贸易的历史	(268)
二、机器缫丝厂的创力和发展	(273)
第十一章 面粉进口替代工业	(293)
一、创始和初步发展期(1898—1913 年)	(294)
二、全盛时期(1914—1921 年)	(296)
三、缓慢发展及其原因	(300)
四、畸形状态	(303)
第十二章 钢铁、船舶修造和机械工业	(306)
一、钢铁工业	(306)
二、船舶修造业	(315)
三、机器工业	(324)
第十三章 卷烟、火柴业	(332)
一、卷烟工业	(332)
二、火柴工业	(343)
第十四章 水泥、皮革工业	(354)

一、水泥工业	(354)
二、皮革工业	(363)
第十五章 蛋品加工、制茶、榨油工业	(371)
一、蛋品加工业	(371)
二、制茶叶	(380)
三、榨油叶	(385)
第十六章 造纸、印刷工业	(394)
一、造纸工业	(394)
二、印刷工业	(397)
第十七章 兵工业	(403)
一、起步的背景、原因	(403)
二、枪炮、轮船与飞机的发展状况	(406)
三、不发展的一面及原因	(410)

第一章 总 论

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代，史学界有不同看法：一种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萌芽于唐宋时代；一种认为在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以后，中国才有资本主义萌芽。赞同这两种意见的只是少数，而中国学术界绝大多数都肯定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萌芽于明代中叶，到清代乾隆、嘉庆时期（18 世纪）有所发展。

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时产生的，因此说，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归根到底是要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力。因为“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①只有在农业生产发展、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的条件下，才能生产出更多的商品粮食投向市场，才能把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部分地解放出来改种经济作物。

明清时代，经过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农具及生产技术都有所改进，尤其是水利灌溉事业有较大发展，如北方推广凿井溉田^②，南方推广水车溉田^③。各个地区的灌溉面积大为增加，四川省彭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885 页。

②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 36。

③ 咸丰《盛京通志》卷 34。

县、中江、崇庆等县,山东省邹平、范县等县地方志书中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与此同时,各种农作物也有所推广,一些高产作物如玉米和蕃薯也开始引入和传播^①。玉米和蕃薯的传播,推动了耕地面积的扩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水利灌溉条件的改善和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提高了农业产量,使农民手中有了部分积蓄。

更为重要的是,明清时期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十分显著,出现了一些棉、桑、蔗、烟、果树园艺等专业种植区,形成了地区间的生产分工。当时经济作物收益与粮食作物相比要高得多,嘉靖年间,湖州府属种一亩桑苗的垦锄培壅之费约为银二两,“而其利倍之”^②。明朝后期,或谓一亩烟田的产值“敌田十亩”^③。清代前期,汀州府八县,种烟利厚,“所获之利息数倍于稼穡”^④。正因为如此,人们种植经济作物的积极性大为提高,甚至将稻田、粮地改种经济作物。如福建泉州府民将稻田改为蔗田^⑤,江西大庾、新城等县,四川合江县,山西保德州,山东济宁州的人们纷纷将稻田改为烟田。

明清时期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加深了农业经营者和市场的联系,促使各类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明代以后,地方小市场即墟集贸易,逐渐起着大宗商品集散地的作用,以至成为真正的初级市场;随着贩运贸易的发展,在沿长江、运河等商路要道上,逐渐兴起一批商业城市,以至出现如佛山、汉口这样巨大的商镇。这些城市市场的出现,反映了真正商品流通的扩大;长距离贩运贸易,也由原来官营和专卖品贸易逐渐转向以民生用品为主。同时,许多条 1000 公里以上的贸易路线也在这一时期开通。如明初南北大运河全部开通,清代时长江航运畅达上游。从上海到华

① 陈树平:《玉米和蕃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② 《吴兴掌故集》卷13,《物产》。

③ 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下。

④ 王简庵:《临汀考言》卷6。

⑤ 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

北、东北的北洋商运也是清代发展起来的。到清中叶,我国内河航程约达5万公里,已具近代规模。明代后期,出现了许多大的贩运商帮,如徽商、山陕商等。到清代,大商帮更是骤增,商人会馆林立,经营也具专业化。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条件。“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生产的历史前提。”^①明代中期我国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

劳动者自由出卖他们的劳动力或者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的另一个重要的前提。由于明代统治者的残酷剥削,造成了农民的极度贫困,许多农民不堪税粮和差徭的压迫逃亡外地,成为闲散的劳动力。从永乐年间起,中经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等朝,单是荆襄汉中一个地区,外来逃民就常常在百万人左右,多的时候甚至在一百五十万人以上^②,可以说,无论是腹里地区或是滨海一带,都已经存在成千上万的待雇佣的闲散劳动力或无业游民。他们即使没有名义上的迁徙和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实际上却已经获得了这种自由。

要进行资本主义生产,除了具备市场和雇佣劳动条件之外,还需要有资本的来源,即货币财富的积累。明清时期,货币财富主要掌握在勋贵、缙绅、豪强、地主、商贾等人手中。这些靠剥削或掠夺积累起来的财富,除个别商贾用来经商和兴办手工业外,大多是用以供应本身穷奢极欲的挥霍及“报效”封建国家和贿赂封建官吏,此外就是兼并土地。因此,当时巨大的货币积累是否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明代商人资本有显著发展,兴起了许多大的商帮。如安徽商人、山西商人、陕西商人以及江苏、福建等大商帮。这些商人的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67页。

^② 项忠:《抚流民疏》,《明经世文编》卷46,影印本第1册,第359-361页。

本究竟有多大,没有确切记载,我们只能从零星资料中得到初步了解。万历时,徽商“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商人”,“其富甚于新安”^①。“大贾辄数十万,则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数人”^②。山西商人,“非数十万不称富”。由此可见,明后期的商人资本,二三十万两为中贾,五十万两以上者为大贾,而达百万两的巨贾则寥寥无几。即使五十万两以上的富豪,全国也为数不多。“严世藩……尝与所厚屈指天下富豪居首等者,凡十七家。……山西三姓;徽州二姓;与士官贵州安宣慰。积资满五十万以上者,方居首等。先是无锡有邹望者将百万,安国者五十万。”^③这里所说全国17家头等富豪中,经商起家者只有7家。

在明后期的商人资本中,除用于经商、购置土地外,开始伸向生产领域,投资于手工业。有记载者如租山开矿、开设铁冶、开设染坊等。但这种情况还是个别现象,能够直接证明的只有三五例。他们多半是雇工生产,因而有一定规模,即可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

明代后期手工业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有直接史料加以确证的,还只有两项:一是苏州、杭州的一些丝织工场;一是广东佛山的某些冶铁和铁器铸造工场。据记载:“吴氏生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④“诸所铸器,率以佛山为良。……其炒铁则以生铁团之入炉,火烧透红,乃出而置砧上。一人钳之,二三人锤之,旁十余童子扇之。童子必唱歌不辍,然后可

① 谢肇淛:《五杂俎》卷4。

② 《肇域志》第3册,第43页。

③ 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36。

④ 明《神宗实录》卷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

炼熟而为锅也。”“计炒铁之肆有数十，人有数千。一肆数十砧，一砧有十余人，是为小炉。炉有大小，以铁有生熟也。故夫冶生铁者，大炉之事也；冶熟铁者，小炉之事也。”^①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当时的作坊中已经出现了明确分工和雇佣劳动关系，形成了工场手工业规模。这样的事例虽然不多，但也足以说明在明代中后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到了清代前中期，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制茶、制烟、酿酒、榨油、制糖及江苏、浙江的丝织业、苏松地区的棉布加工业、陕西的木材采伐业、云南的铜矿业、山东博山和北京西部的煤矿业、景德镇的制瓷业、四川的井盐业、河东的池盐业、淮南的海盐业、上海的沙船运输业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然而，总体上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十分迟缓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明代后期萌芽后，经过 300 多年，直到鸦片战争前，也未能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所以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明清封建专制政权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明清时期，封建国家对待城市工商业，除了维持官营手工业生产外，对民间手工业和商业，总的方针是抑制而不是奖励，是重税而不是轻税，是掠夺而不是扶植。国家采取抑商政策、闭关政策、重税政策、矿禁政策等，使民间工商业长期陷入困境。

重本抑末政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政策。农业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也是封建赋税和地租的基本来源。历代王朝实行重本抑末，其目的是为了保持小农经济，防止弃本逐末，增加国家农业税收，稳定国家财政收入。明嘉靖时，国家财政出现危机，封建士大夫将其归罪于农民大量逃离农村。认为“正德以

^①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15，货语，铁。

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自四五十年以来……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①。“逃移不禁,耕稼不劝,故奸民得以避劳就逸,弃本逐末”,因此必须“立法以检制之”^②。可见明朝后期是一直执行抑商政策的。

清朝政府继续推行抑商政策。雍正在上谕中曾经指出:“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本务,而工贾皆末也。……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因此,要劝导百姓“使民知本业之为贵”^③。在重农抑商政策的抑制下,清代的手工业只是农民的家庭副业,很难形成工场手工业规模。因此,重农抑商政策使我国传统的优秀手工业生产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闭关海禁政策是明清时期采取的一项愚蠢的自我封锁政策。明代由于防止倭寇侵扰等原因,自洪武初年,国家就禁止濒海人民私出海外经商,甚至“片板不准下海”,并为此制订了严酷的法律。隆庆初年,虽一度允许“通东西二洋”,但“凡走东西二洋者,制其船只之多寡,严其往来之程限,定其贸易之货物,峻其夹带之典刑,重官兵之督责,行保甲之连坐,慎出海之盘诘,禁番夷之留业,原举首之赏格,蠲反诬之罪累”^④。清代的闭关政策,严格地说,应当从康熙五十六年的“禁海令”开始,此后虽有弛严起伏,但总的趋势是门户越来越小,限制越来越严。清政府不但禁止中国商人出海贸易,对来华外国商人也严加管束,凡“夷商到粤,寓歇行商馆内稽查管束,原不许任意出入”;并严令“内地商民,亦不得往来交接”^⑤。为了限制贸易,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起,清政府更制订了防范外国商人的各种章程,如《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

①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3。

② 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皇明经世文编》卷22。

③ 《清世宗实录》卷57。

④ 许孚远:《疏通海禁疏》,《皇明经世文编》卷400。

⑤ 《粤海关志》卷28。

章程)、《八条章程》等。这种经济上的自我封锁,破坏了国内工商业的发展,遏制了中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是极为不利的。

明清两代采取的加重商税政策,压制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明朝后期,“河间一府,地瘠民贫,额税二万五千有奇,敲骨吸髓久矣,夫民不堪命也”。造成“税繁则商困,商困则来者稀。必须取盈其额,纵严刑督责,只驱之掉臂而去耳”^①。万历间,“河西务大小货船,船户有船料矣,商人又有船银;进店有商税矣,出店又有正税。……百里之内,辖者三官,一货之来,榷者数税”^②。而对民间工商业迫害最重的是矿税之祸。明代后期,矿监税使布满通都大邑,“处处开矿,处处抽税。民生处处憔悴,民心处处悲愁”^③。人们惊呼:“今天下所谓嗷嗷,矿税两事耳。”^④

明清时期推行的矿禁政策,同样也限制了工商业的发展。我国的矿业一向是由封建政府所垄断,明代采取官矿政策,禁止私人开采。而官矿的开采效率很低,造成“山泽之利,官取之则不足,民取之则有余”^⑤。清代的矿禁比明代有所松弛。清初,对已开各矿,听民采取输税。乾隆时,对广西、云南、贵州的金、锡、铅、铁、水银等矿,对山西、四川、广东的金、铅、锡、铁等矿,对湖南的金、锡、铅、银等矿,都招商开采^⑥。但商民具呈开采新矿,必须在各省督抚“委官监督”之下进行。商民开矿,“若有碍禁山风水,民间庐墓,及聚众扰民,或岁歉谷踊,辄用封禁”^⑦。嘉庆六年(1801年),直隶商民请开平泉州属四道沟、云梯沟等处铜矿,嘉庆认为,“倘已聚集多人,而铜苗渐竭,彼时何以遣散,岂不虑其滋生事端?”因此下令

① 王纪:《请豁重叠小税疏》,《皇明经世文编》卷473。

② 肖彦:《敬陈未议以备采择以裨治安疏》,《皇明经世文编》卷407。

③ 余继登:《止矿税疏》,《皇明经世文编》卷437。

④ 冯琦:《矿税议》,《皇明经世文编》卷441。

⑤ 《大学衍义补》卷29。

⑥ 《乾隆会典》卷17。

⑦ 《清史稿》卷124。

“著永远封禁，不准开采”^①。

其次，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生产结构，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农民家庭手工业，主要是自给性生产，它的发展，起着巩固自然经济、限制社会分工、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在明清时代，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生产结构，占据绝对优势。这是因为，一方面，农民家庭手工业可以利用全部农闲时间，利用全家男女老幼的劳动力，实行最有效的分工和协作，这样就造成了“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②。同时，农民通过家庭手工业，可以获得颇为有效的经济收益，用以缴租还债，迎婚嫁女和度过灾荒。这就使得小农经济对于封建剥削具有较大的负荷能力，对于人口增殖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家庭手工业没有脱离农业，因此，不害怕产品卖不出去，即使他们的产品由于某种原因在市场交换中蒙受损失，仍然有农业作为生存的保障。并且，农民从事家庭手工业，主要还是自给性生产，有余才出卖，这种自给性生产，就更加难以代替了。

一般说，历史是经过小商品生产的充分发展，才能走向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这种小商品生产指的是城乡独立的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也是以此为基础的。而家庭手工业，却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大的排斥力，甚至对于机器大工业的产品也有顽强的抵抗力。所以，农民家庭手工业，无论对于独立手工业来说，或是对于资本主义萌芽来说，都是一种限制力量。

第三，分配上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三位一体，是我国封建经济比较稳定和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③ 明清时期，封建社会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为了追求更高的剥削率，相互结合起来，构成了能为封建阶

① 《清仁宗实录》卷 87。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第 373 页。

③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307 页。